

陕西师范大学学术文库

《六书故》研究

党怀兴 著

LIUSHUGU YANJIU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导 言	(1)
一、作者戴侗	(3)
二、《六书故》的写作目的与成书	(6)
(一) 写作目的	(6)
(二) 成书	(8)
三、《六书故》的版本	(16)
四、《六书故》的体例	(19)
(一) 说解体例	(19)
(二) 分类编排	(23)
(三) 多字字头	(28)
五、《六书故》的收字与字体	(30)
(一) 收字	(30)
(二) 字体	(32)
六、《六书故》形义关系论	(40)

(一) 分析文字的基础——六书理论	(40)
(二) “父以联子, 子以联孙”的 文字分化孳乳系统	(46)
(三) 运用钟鼎文考释文字	(59)
(四) 文字变易种种	(69)
(五) 《六书故》所引唐本《说文》考	(74)
(六) 《六书故》所引蜀本《说文》考	(87)
(七) 利用谐韵考音识字	(92)
七、《六书故》音义关系论	(96)
(一) “因声以求义”论的理论基础	(96)
(二) “因声以求义”论	(101)
八、《六书故》释义论	(156)
(一) 释义的系统性	(156)
(二) 释义的依据	(165)
参考文献	(178)
附录: 《六书故》与《说文》对照索引	(180)
后记	(248)

导 言

宋末元初戴侗的《六书故》，在中国文字学史上是一部非常特殊的著作。自刊行至今，学界的评论毁誉不一。有极力诋毁的，也有极力推举的。极力诋毁的，如元吾邱衍所说：戴侗“以钟鼎文编此书”，“形古字今，杂乱无法”，“以门类为次第，仓颉之法到此地为一厄矣”。^①近人胡朴安先生也说：

《六书故》及此后以“六书”命名的字书都是“无甚价值之文字学书”。^②极力推崇的，如今人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所说：“由宋以来，文字学上的改革，到他是集大成了，他的解释有些地方实胜过《说文》。”^③“对于文字的见解，是许慎以后唯一的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④为什么对《六书故》会有如此对立的评价？从元代以来的中国文字学的研究来看，元、明、清三代的文字学家大多轻视《六书故》，指责较多，这主要是因为《六书故》打破了《说文》以来的文字学的系统，从正统的角度看，这是大逆不道的。近代以来。越来越

①《学古编》卷下。

②《中国文字学史》，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251页。

③《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370页。

④《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7页。

多的文字学家重新认识《六书故》，对《六书故》的评价逐渐趋于客观，但这些研究都还是一鳞半爪。在中国文字学史上，我们究竟应对《六书故》作什么样的评价？《六书故》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究竟有哪些重要内容？有哪些成就和影响？究竟有哪些不足？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人对《六书故》作过系统深入的研究，还没有给《六书故》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本书旨在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六书故》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评价，在中国文字学史上给它一个应有的地位。

一、作者戴侗

戴侗，字仲达，或又称戴合谿^①，浙江永嘉人。生卒年月不详，但大体生活年代还是比较清楚的，即生活于宋末元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六书故》下云：“《六书故》，三十三卷，宋戴侗撰。考姓谱，侗字仲达，永嘉人。淳祐中登进士第，由国子监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秘书郎迁军器少监，辞疾不起，其所终，则莫之详矣。”

据清《永嘉县志》卷13《人物志·儒林》记载：“侗字仲达，登淳祐辛丑第。”^②由此可知，戴侗于宋理宗淳祐辛丑（公元1241年）登进士第，后由国子监簿守台州。宋少帝德祐初年（公元1275），^③由秘书郎迁军器少监，辞疾不起。辞疾不起的原因也许是由于他已看出南宋将亡，要被元蒙取而代之势。在德祐元年三月，元将伯颜兵临临安，宋奉表投降，宋全太后、帝昀等被虏去。当是由于不愿做亡国奴而从此隐居起来，潜心著述。据凌迪知《古今万姓通谱》记载：戴侗“年逾八十卒，有《易书四家说》、《六书故》内外篇”。疑此所

①清代吴玉搢《六书部叙考·序》。

②清代张宝琳等修纂，光绪八年刻本。

③德祐元年为1275年，第二年即1276年五月，王昀帝即位，是为景炎元年。

言内外篇当分别指今存《六书故》及书前的《六书通释》。
《易书四书家说》已佚。

戴侗屡言其为书积30年之功，在考证文字时也曾引述自己为官时所闻所见，由此可以断定，戴侗为官于南宋末年，而著书于元世初叶，生活年代为宋末元初。戴侗是一个跨越两朝的人物。学术界或称戴侗为宋人、宋末人、南宋人，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等；或称戴侗为元人，元初人，如清儒所辑《元艺文志》（将《六书故》列入），清人丁福保《说文诂林》、今人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等。两说都各执一偏，稍欠允当。

戴侗的具体生卒年代不详。据有关资料考证，其生年当在宋理宗宝庆年间（公元1225—1226年），卒年约在元武宗至大年间（公元1310—1311年）。戴侗登淳祐元年辛丑第，时在1241年，德祐初（德祐仅二年，德祐二年，即1276年，是年五月新帝即位，又改元景炎）称疾不起，从登第到辞官计三十四五年，这是他游宦的30多年。戴侗在《六书通释》中屡言“予为书三十年而未卒功”、“予故约其三十年之功以为书”。从一些文字的考释可以看出^①，戴侗著述《六书故》当在其辞官之后，其辞官后三五年南宋即亡，进入元朝，元朝30年当是戴侗著述《六书故》的30年。由德祐初下推30年，《六书故》成书当在元大德八年或九年（公元1305—1306年）。成书后不几年戴侗即辞世，下浮5年，戴侗卒年约在元武宗至大年间（公元1310—1311年）。据凌迪知《万姓统谱》，戴侗“年逾八十

①《六书故》卷17“芾”下云：“……《说文》曰：‘相当也，读曰’。’予宦越，览讼牒有芾折语，正音”。

卒”，由此上推80年为公元1230—1231年，上浮5年，戴侗生年约在宋理宗宝庆年间（公元1225—1226年）。^①

戴侗生长于书香门第，其父戴蒙，字养伯，其先由闽徙永嘉，居住在楠溪菰田。宋绍熙庚戌（公元1190）年，用阁门舍人戴勋牒改名野，字子家，中第，调丽水尉，以公事与郡将忤，弃官从学于武夷朱晦庵（熹），著有《易书四书说》、《禹贡辨》；戴侗之兄戴仔，字守镛，举郡孝廉，“年四十弃场屋，肆力于学，《诗》、《书》、《易》、《周礼》、《四书》皆有传述，其诗文曰《开治堂集》”。^②此外，戴侗的先人及伯、舅都对六书训诂之学有过研究，因此戴侗在书中常引述他们的观点，如“先人曰”、“外王父曰”、“舅驷曰”、“伯曰”于《六书故》中习见。

①今人钱剑夫先生《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认为《六书故》刻于元世（公元1320年），距其成书时大约已60年。据此，钱氏认为《六书故》成书约在宋理宗景定初年（公元1260年）。我们据有关资料确知戴侗于宋理宗淳祐辛丑（公元1241年）登进士第，戴侗屡言积30年之功而成《六书故》，而从淳祐辛丑登第到景定初年才20年，此间，戴侗也不可能全力著书，所以钱氏推论《六书故》的成书时间不确。又我们确知戴侗于淳祐辛丑，即公元1241年登进士第，设若其在20岁到17岁间登第，其生年当在1221—1224年间，与此所推几乎一致。

②参《永嘉县志》卷11“进士”，卷12《人物志·儒林》。

二、《六书故》的写作目的与成书

（一）写作目的

戴侗为什么要积30年之功撰述一部文字学著作，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考虑？

在《六书通释》及《六书故》正文某些文字的说解中戴侗对他撰述《六书故》的动机有过具体的陈述。

“正名”为治国之本，考文为“正名”之基。戴侗认为孔子最先提出的“正名”理论是非常正确的。国家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很好地正名，名实混乱，而名实混乱的根源在于文字的混乱：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文者，名治之大者也；文惑则名乱，名乱则实易；名乱而实易，则民听惑、号令昏、法度舛、礼乐坏而乱益生。

因此，消除社会混乱的根本在于从文字入手，考定天下之文：

君子如欲善治，其必由正名乎？古之明民者，观于天文，仪于地理，比类万物，釐制百则以正天下之名。以定天下之文，简而核，约而备，通而不越，察而不烦，事物载焉，法象备焉。

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天下大治的局面：“故名不贰、实不迁而

听不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法度粲焉，礼乐昭焉。”

自秦以来的情况正是名实混乱，六书不讲：

周之衰也，官失其守，士失其学，及秦焚书，先王之迹一绝不继。自篆而八分，自八分而行楷，讹以传讹，谬以传谬，至于今日，文乱极矣，况于名乎？

由秦而下，六书之学遂废，虽有学焉者，往往支离傅会而不适于道。至与曲艺小技下为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学益不讲，千载而下，殆无传焉。^①

这种情况正是戴侗所不愿看到的，因而，他要革除文字研究中的弊端，整治名实混乱的现状，“由千载之下溯千载之上，以探不传之学”，以“正名百物”，从而承继六书训诂之学的道统。因此，我们可以说《六书故》是一部力图改变自秦以来的文字研究现状，探究文字本源，研究文字变迁的一部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字学著作。

戴侗清楚地认识到“六书”是治学的根本。六书通，即可贯通所有文字；文字通，即可贯通辞章、明晓义理；进而知治天下万物。相反，“训诂之学不讲，一字之义不明，而圣人之精义千载莫识^②”。“夫不明于文而欲通于辞，不通于辞而欲得其意，是聋于律而议乐，盲于度而议器也，亦诬而已矣”。^③进而戴侗指出：

六书者，群经诸子百氏之通释也。六书苟通，由是而往，天下之书，不待注疏皆可读也。六书不通，而以臆说谬为之注疏，是瞽而为向者也，祇益其迷。^④

六书既通，参伍以变，触类而长，极文字之变不能逃

①③参戴侗《六书故叙》。

②参《六书故》卷14“振”下。

④《六书故·六书通释》。

焉，故士惟弗学，学必先六书。^①

六书者，格物致知之学，不可徒以为小学而已也。学文者必由是以入者，入学者先之。^②

清人关于识字与读经的关系的论述与戴侗所述如出一辙。清代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通过对字义的疏证对程朱理学进行批判，进而阐发自己对儒学的看法。由此可见，文字是一切学术的基础，读书明经要从考识文字始，已成为向来方家治学的经验之谈。而戴侗较早地全面论述这一问题，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

总之，戴侗撰述《六书故》是要为人们认识文字，正名辨物，读书明经服务，进而“以通天下之故，以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可以行其所无事矣。”^③戴侗以考识文字为治学的根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推而广之，以为“凡天地万物之载具于六书，能治六书者，其知所以治天地万物矣”，^④则过分夸大了“六书”研究的作用。

（二）成书

《六书故》成书的具体时间不详。据有关材料考证，其成书时间当在元大德八年或九年（公元1305—1306年）。^⑤

①参戴侗：《六书故叙》。

②参《六书故》卷14“振”下。

③④《六书故·六书通释》。

⑤参本书“作者戴侗”一章。又予师兄刘斌在《戴侗与〈六书故〉》一文(文载《辞书研究》1988年第2期)中认为《六书故》成书在咸淳至德祐年间(公元1265—1275年)。他认为戴侗作此书用了30多年时间，设若戴氏在淳祐年前后始撰《六书故》，那么成书当在咸淳至德祐年间。此说非是。淳祐辛丑，是戴侗登进士第之年，从此开始宦宦生涯，绝非开始著述《六书故》之年。

戴侗能完成《六书故》，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促成的。这主要表现在：

1. 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两宋疑古思辨学风的影响

有宋一代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一个推求义理、提倡思辨的时代，是一个学术自觉、学术变革的时代。宋人一反唐人格守“五经”、“疏不破注”的陋习，敢于变革，创发新义，开一代疑古求真的风尚，对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较大突破。自庆历以后，刘敞、欧阳修等对经传大胆怀疑，摆脱汉唐旧说，创发新义，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先是刘敞撰《七经小传》，开宋人评议汉儒之先声。欧阳修撰《毛诗本义》、《易童子问》，指陈汉代注释的流弊，并对向来视为经典的著作《尔雅》提出怀疑：“《尔雅》非圣人之书，不能无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①此后理学大家朱熹在古代文献的研究中，更是彻底地贯彻理学家“会疑”、“贵思”、“造道”精神，^②大胆探索，“格物穷理”，在其所著《诗集传》、《周易本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等著作中，更进一步删削、颠倒经文，抛弃旧说，敢于怀疑，多有创见。如对《诗序》视为正统德教的《郑风·子衿》等诗，朱熹认为均为表现男女爱情的“淫奔之诗”，当为的见。再如对梅賾所献《古文尚书经传》，虽自来无人怀疑，视为正统。但朱熹认为：“《书》凡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藏之中，不能损一字哉？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难，则易者

^①参《小学考》卷3。

^②钱穆：《国学概论·宋明理学章》，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全不能记也！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未之见，可疑之甚！”^①朱氏弟子蔡沈作《书集传》，即承其师说，摒弃《书·序》。从师承关系看，戴侗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是必然的。戴侗之父戴蒙曾从学于朱熹，戴侗又深受其父的熏陶。受理学疑古思辨精神的影响，戴侗对“小学”的研究，敢于怀疑权威，提出新见，他时时以探究“小学”问题的根本之“理”为己任。正如他自叙《六书故》创作缘由所说：“……夫不明于文而欲通于辞，不通于辞而欲得于意，是聋于律而议乐，盲于度而议器也，亦诬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于家，且将因许氏之遗文订其得失，以传于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惧先志之坠，爰摭旧闻，辑成三十三卷，通释一卷。”^②由此可见，戴侗正承继其父订正《说文》之志而撰成《六书故》。因此在《六书故》中戴侗直言《说文》谬误屡见不鲜，指斥《尔雅》之误也随处可见。^③当然也有一些指责是错误的。但他不恪守权威，不以权威为是的精神，确是宋儒一贯风格的体现。

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也正是理学家的思想给了戴侗认识问题新的理论视角。程朱理学认为“理”与“器”是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理”是“形而上”的“道”，是“抽象”的；“器”即个体的事物，是“形而下”的，是“具体”的。^④朱熹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有某物即有某理，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⑤“格物穷

①朱熹《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

②戴侗《六书故叙》。

③参本书“《六书故》释义论”章。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329页。

⑤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39页。

理”是理学家的使命。戴侗深明“道”与“器”的关系，他在探讨词义引申的规律时认为具体的词义之所以能引申出抽象的意义就是因为词义的引申体现了“器”与“道”的“具体”与“抽象”的物理关系。他说：“夫有物则有则，则非离物也；有器则有道，道非离器也。”“圣人因器以著象，立象以尽意，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而天下之精义靡有遗焉。”^①戴侗关于“道与器”的阐述与程朱理学如出一辙，足见其所受影响之一斑。

2. 以宋代为主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果的奠基

同时代及先代的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是戴侗撰著《六书故》的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宋代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新材料的发现上看都不同于其先代，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后来的研究者启迪不少，可以说元明清以来学者们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宋代学者已开其先。戴侗能够在文字研究上取得一些成绩，与宋代学者的学术积累是分不开的。如宋代王安石的《字说》，王圣美的“右文说”，都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说文》以来的文字学理论提出了挑战，都在试图探讨语音与语义的特殊关系。虽然王氏的《字说》招来不少非议，但其追寻音义关系的企图是值得肯定的。王圣美“右文说”对音义关系的探讨基本上是正确的。戴侗对“六书推类”的研究、对同族字的系联，实际上是对王圣美“右文说”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使这一理论更加系统化、条理化。清代及近代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

^①参《六书故·六书通释》（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参见此文）。

丰硕的成果，其受王圣美以来“右文说”的影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再如“金石学”在宋代有长足发展，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都是较早系统地研究铜器的著作，较早地研究金石文字的是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金石学的兴旺发达，促使戴侗在《六书故》的文字考释中大胆引用金文字形及铜器款式，取得了不少的新见。《说文》之学在宋代的发展也是前代不可比拟的。大小徐的《说文》研究在中国文字学史上是十分突出的，可谓是《说文》的功臣。此后郑樵的《说文》研究更是独树一帜，其《通志·六书略》关于文字、关于许慎《说文》的见解多有创见。戴侗《六书故》于大小徐及郑樵的文字学观点取证不少，戴侗的一些观点受他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文字的母子说”等。

自汉许慎《说文》以来的历代字书给戴侗撰著《六书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料。戴侗在《六书通释》中对此有过明确说明：“凡字书有二：以文求之者，其传于今则有《说文》、《玉篇》、《类篇》诸书焉；以声求之者，则有《唐韵》、《集韵》诸书焉。”自《说文》之后各种字书，戴侗屡加称引，达30多种，举其要者有：《释名》、《字林》、《玉篇》、《广雅》、《切韵》、《广韵》、《集韵》、《钟鼎篆韵》、《汗简》、《古文四声韵》、《古今字诂》、《字诂》、《古今字林》、《通俗文》、《三苍解诂》、《说文篆韵谱》等等。其中按声编纂的字书启示戴侗认真探究文字的语音，从而得出与一般韵书按韵排字不同的新观点：“声，阳也，韵，阴也；声为律，韵为吕；今之为韵书者不以声为纲，而韵者每以韵训字，故其义多忒。声之相近也，犹祖宗众姓之相生也，其形不必同，其气类一也，虽有不同焉者，其寡已矣。”即应以汉字的声统韵，声是主要的，而不是相反，只有

这样才能贯通声近义通的字。这是戴侗“因声求义”说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前代字书为《六书故》的成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戴侗在《六书故》中还引用了大量的经传注疏资料，条分缕析，详加考辨，这都保证了其释义的科学性。

3. 以“父子昆弟自为师友”为特征的家学熏陶

戴侗生长于书香门第。其父戴蒙曾受学于理学大家朱熹，并著有《易书四书说》、《禹贡辨》等。其兄戴仔“年四十弃场屋，肆力于学”，于群经皆有传述，著有《开治堂集》。此外，戴侗之“伯”、“外王父（外祖父）”、“舅”等都于文字训诂学有过研究，戴侗在《六书故》中屡屡称引他们的观点。因此，《六书故》的成书得力于戴侗的特殊家学是显而易见的。如元代赵凤仪在《六书故序》中所说：“公之父蒙从学于武夷，兄仔举郡孝廉，父子昆弟，自为师友，是书之成，渊源有自。”

在《六书故》及《六书通释》中，戴侗也屡次提到家学对自己的影响。如戴侗《六书故叙》开首第一句话即是：“侗也闻诸先人曰：学莫大于格物，格物之方取数多者，书也，天地万物古今万事皆聚于书。”继而戴侗阐述“六书”之重要，认为“六书”是“入学之户门，学者之所同先也”，“夫不明于文而欲通于辞，不通于辞而欲得于意，是聋于律而议乐，盲于度而议器也，亦诬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于家，且将因许氏之遗文订其得失，以传于家塾而不果成”，其《六书故》即据先人遗训，承先人之志编述而成。如在“道”下所言：“六书非小学也，侗故因先训而备论之。”^①因此，可以说，戴侗关于文字的

^①参《六书故》卷16“道”。

一些论述，其实来自于他的父亲、兄长及亲戚，没有他们的熏陶与教导，戴侗是不可能写出这样有特色的文字学著作的。

4. 以“严谨”、“求实”为目标的治学追求

清代学者桂馥《说文义证》把唐宋以来的小学研究分为二派：一派为“遵守点画者”；一派为“私逞臆说者”。将王安石《字说》、杨桓《六书统》、周伯奇《六书正讹》与戴侗《六书故》划归此派。桂氏之说实欠公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对《六书故》的评价较为客观：“其苦心考据，亦有不可尽泯者，略其纰谬而取其精要，于六书亦未尝无所发明也。”戴侗在撰著《六书故》时不迷信权威，不盲从旧说，如他所说：“学者当唯是之从，不可据古而非今也。”^①他于文字的说解绝不信口雌黄，他积30年之功完成《六书故》所追求的是通过一番苦心考证，追寻文字表义之本，探讨文字发展演变的规律。他于文字的说解考证都旁征博引，达到信而有证。如他在《六书通释》中所以说：

欲以一方之见而尽万物之载，难矣，况其名物错糅，州异而县殊，以名而求诸书，固常不尽，以字而求其物，又多不得，予书非能尽物也，姑著其有征而信者焉，其所不知，以俟知者。

予为六书三十年而才苟完，每参校一部，摊书满案，左采右获，手疲目眩。

他常抚书而叹：“孰知夫作书者之难哉！”如元代赵凤仪在刊刻《六书故》所写的《序》中所评价的：“群经子史百家之书，莫不爱据，示有征也，析为部九，卷三十有三，约而不遗，通而不凿。”赵氏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于此可见戴侗的写作态度、治学追求。也正因此，其于文字的考证才有所发

^①参《六书故》卷29“武”条。